

首页 >> 跨学科 >> 文史哲融通

以诗为墨的地理画卷

2020年10月22日 09:54 来源：中国社会科学网-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：王红娟

打印 推荐

《汉书·地理志》（简称《汉志》）记述了平帝元始二年时103个郡国的概况，尤可道者是它的郡国排序。有人说它杂乱无章，也有人怀疑它受到了兼有“由东方按顺时针方向转至北方”“自近而远”特征的“早期原型”的影响。那么，到底是“无章”，还是“有章”？若“有章”，“原型”又会是谁？这些问题关系到作者班固的逻辑、《汉志》的品质以及先秦两汉地理学的传承，很有探究的必要。

有一种很好的探究方式，便是按图索骥。谭其骧主编的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的西汉部分，是据《汉志》绘制，所以，它就是最好的“图”。只要按“图”逐一连接起83郡、20国，也就可以直观地“画”出《汉志》的逻辑。从整体上看，它们的走势表现出趋“近”、趋“中”和顺时针性。其中，“中”是东西南北中的“中”，“近”则是指与国都长安的远近。

20国的情况相对简单。它们散落在长安以东，北起广阳，南至长沙，西线的赵国与淮阳靠近长安，淮阳的位置也大致居南北之中。于是，自赵国始，北上广阳，东至胶东，南折淮阳；再从淮阳出发，北上东平，东达广陵，南抵长沙，一上一下地形成了两个半圆，交于淮阳，连接成了个数字“3”。每个半圆的起点都靠近长安，是自“近”始；中折淮阳，上半圆起点赵国的位置也大致处于该圆的南北之中，是趋“中”。故其整体走势便是趋“近”趋“中”的顺时针环进。

83郡的走势则更为复杂，也更加完整清晰地呈现出环进特征。京畿三辅是起点和中心，由此出发，东经太原至南郡、江夏至涿郡、渤海至会稽三列东麓列郡的波折后，转向南麓的桂阳、零陵、益州一脉，继而西进敦煌，北归上谷、渔阳诸郡，再东行至更外层的乐浪，南止于交趾，形成了中—东—南—西—北—远东—远南的整体走势。其特征是由近及远、从中至东的顺时针环进。

两条曲线的基本特征一致，而20国之所以没有形成完整的环进，只是因为它们都在长安以东，不能像83郡那样包裹着长安周转卷进。所以说，83郡的走势更完整，也更能代表《汉志》的“章法”。而且，这也将前学找到的“由东方按顺时针方向转至北方”“自近而远”的规律贯穿了起来。

窥其“章法”后，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寻找与之契合的“原型”。首要的查证对象自然就是先秦的地理文献，而且，一些文献中也确实出现了类似的“端倪”。比如《山经》，它的结构主体是南、西、北、东、中五山，故而又称《五藏山经》，而其逻辑曲线就很像字母“e”，不过是颠倒了笔序，止笔处居中而已。还有《禹贡》，冀、兖、青、徐、扬、荆、豫、梁、雍“九州”的方位逻辑，走势是自北向东再向南顺时针转半圈后，折入圆心，再向西折出，继续顺时针地北转而止。很明显，它们都已具备了五方概念和顺时针逻辑，但尚未表现出明显的趋“中”性和由近及远的特征。

有趣的是，反倒看似与地理关系不大的《诗经》，却在“十五国”排序上显示出更多的共性。公元前544年，吴公子季札“聘鲁观乐”，历观周南、召南、邶、鄘、卫、王、郑、齐、豳、秦、魏、唐、陈、郕十四“风”，再加上很可能被省略了的“曹风”，便构成了异于今序的旧貌。

经考察，此序或与周平王有关，排序的思想也大致有三：其一，“周南”至“王风”是以周兴克商至东迁的历史来为东周正名；其二，“郑风”至“唐风”是依中（郑）—东（齐）—南（缺）—西（豳、秦）—北（魏、唐）的方序编诗，旨在利用中顾四野的立场来向世人“宣告”东周天子的共主地位；其三，“陈风”以下，只是择小邦之“风”以为补缀。

其中，第二层排序的方位逻辑与《汉志》极似。它也是从靠近政权中心的地方开始，以之为中，继而向东，再顺时针环进，唯因南无楚风而缺略。其“章法”竟全同于《汉志》，且又不再是《山经》《禹贡》那样的地理学“假想”，而是对现实邦国地理的真实“操作”。这也是目前可以察见的最早、最真实、最契合的“原型”。它与《汉志》的一致，以及班固杰出的诗学造诣，都有理由使人相信，它或曾直接、间接地影响过班固。他的郡国列序，就是将诗国地理的“方序要义”运用、转藏于《汉志》的结果。

继之“方序要义”，再观诗国地理对于《汉志》的影响，豁然可见，前者并非唯一。“郡国篇”后，班固又在辑论刘向“域分”、朱赣“风俗”的基础上，拟分区划，条陈风俗，创作了《汉志》之“风俗篇”。其中就有许多对诗国地理之“区划要义”“风俗要义”的“运藏”。

班固的风俗区划常以诗国为证，彰显并利用了其“区划要义”。如记“故秦地”，言“《诗》风兼秦豳两国”；记“河东地”，言“《诗》风唐、魏之国也”；记“宋地之济阴定陶”，言“《诗》风曹国也”。《诗经》的创作历时五百余年，诗国的概念也因包容了其间复杂的舆地变迁和文化交汇而内涵丰富，故以之为证，不但更易与纷繁交错的风俗区划相对应，兼也赋予了后者以更广阔的时空外延、更丰富的历史内涵。因此，这样的引证不仅合适又巧妙，也让悠久的诗国地理的“区划要义”得以彰显。

同样的妙用还见于班固的风俗论议对诗国地理之“风俗要义”的引证。如引“《豳诗》言农桑衣食之本甚备”，证故秦地“民有先王遗风，好稼穡，务本业”；引《出其东门》《溱洧》，证郑俗“淫”；引《还》《著》多“舒缓之体”，证齐俗“舒缓阔达”。征引范围遍及二南、王、邶以外的十一“国风”，足见用心。此举不仅为他的论议提供了切实的例证，扩充了汉世风俗的历史渊源，也极大地启发了后人对《诗经》之“风俗要义”的关注。而后，郑玄《诗谱》的风俗描述多与《汉志》“大同小异”，便是显证。

此外，班固对诗国地理之“风俗要义”的重视，还体现在对先贤论议的引用上。

《汉志》在中国史地学史上意义非凡，研究诸端中，其与前代史地学的关联又是其他研究的基础和前提，格外重要。此番考察，大致窥见了诗国地理对于《汉志》的郡国叙述逻辑、风俗区划、风俗论议的影响，既让前者的地理“要义”得以重现，又让班固的“运藏”之举得以彰显。以此为引，可以继续向前追溯，去探寻古老的先秦文献中，还有哪些史地学“要义”隐而未发；也可以拓展延伸，去考察作为汉代史地学丰碑的《汉志》是如何继往开来，在继承了先秦史地学思想智慧的同时，又将汉代史地学推向了新高。

于《诗经》而言，《汉志》也不失为一幅诗国画卷的临摹之作，其意义并不啻于彰弥原作之价值，也为后人留下了观摩原作的视角和方法。《汉志》对诗国“区划要义”“风俗要义”的重视和利用，引发了后学对《诗经》风俗价值的关注，对《诗经》风俗学的发展有辟路之功；其对诗国地理“方序要义”的取鉴和传承，又是一个新的发现，或可为《诗经》史地学研究提供新的线索与启发。

以往，王应麟、胡朴安等先学论及汉代《诗经》史地学、风俗学建树时，避谈《汉志》。吕思勉则看到了以《诗经》考证列国风俗政治的著述中《汉志》的“最为可贵”。如今看来，吕思勉的看法更为公允，而《汉志》之“可贵”，实也值得更多的探索 and 发现。

[相关文章](#)



今日热点

- 佛儒思想对话诠释文明互鉴价值
- 政策促进迈向法律规范：我国长期护理保险立法研究
- 以人民为中心视域下中华法系的创造性转化
- 三个围绕讲清楚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伟大成就
- 科学认识 and 有效把握实现“双碳”目标
- 【社科时评】在创新融合中实现城市有机更新

[回到频道首页](#)

值班电话：010-65393398 E-mail: zgshkxw_cssn@163.com 京ICP备11013869号

中国社会科学网版权所有，未经书面授权禁止使用
Copyright © 2011-2022 by www.cssn.cn. all rights reserved

